

## 《六合丛谈》之缘起

韩 琦

《六合丛谈》是 19 世纪中叶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重要的杂志，不仅介绍了西方科学、宗教、历史等内容，还附以时事新闻，对传播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。<sup>1</sup>此刊主要由伟烈亚力（Alexander Wylie, 1815-1887）编辑，艾约瑟（Joseph Edkins, 1823-1905）、慕维廉（William Muirhead, 1822-1900）、韦廉臣（Alexander Williamson, 1829-1890）则是主要供稿者，虽然杂志上未署王韬之名，实际上他帮助伟烈亚力润色文章，出力不少。<sup>2</sup>对于此刊的发刊缘起，伟烈亚力在《六合丛谈》的小引中有简要的叙述，称：

今予著《六合丛谈》一书，亦欲通中外之情，载远近之事，尽古今之变，见闻所逮，命笔志之，月各一编。罔拘成例，务使穹苍之大，若在指掌，瀛海之遥，如同衽席，是以琐言皆登诸记载，异事不壅于流传也，是书中所言天算舆图，以及民间事实，纤悉备载，粤稽中国，载籍极博，而所纪皆陈迹也。

道出了此书出版之宗旨，欲以中外新知，来替代陈旧的知识体系，让人知道世界发展之大势。不过，《六合丛谈》创刊的真正动机，伟烈亚力并没有明确道出。

1995 年春，作者在英国伦敦大学 Warburg 研究所访问三个月，亚非学院（SOAS）近在咫尺，因此得以时常查利用那里的藏书和档案，如伦敦会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传教士的大量通信，尤其是伟烈亚力和艾约瑟等人的信件，这些档案是研究墨海书馆历史的重要参考。<sup>3</sup>在这批信件中有一封 1857 年 5 月 28 日伟烈亚力写给伦敦会 A. Tidman 的信，附有铅字印刷的 Prospectus of A Chinese Periodical 一页，亦即关于《六合丛谈》编纂的缘起，这对我们了解《六合丛谈》的办刊宗旨、参与人员、决议的形成等内容很有帮助，现全文翻译如下：

<sup>1</sup> 参见沈国威编著《六合叢談の学際的研究》，东京：白帝社，1999。

<sup>2</sup> 王韬把《六合丛谈》上的“西国天学源流”收入自己的文集《西学辑存六种》中，参见拙作：“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华的科学活动”，《自然辨证法通讯》，1998，20(2): 59。

<sup>3</sup> 迄今为止，尚很少有人利用这些信件，笔者在研究伟烈亚力时，曾使用了他初到上海时的一些信件，参见上引拙作，58 页。

考虑到探索和讨论的精神的建立会给中国人带来政治、科学、宗教方面的多重益处，并且相信，为促进这一目的，创建一份杂志是合适的，再者，通过向他们显示他们在地球上的诸民族中的真实地位，[杂志]适合于逐渐消弱那些如此巨大地阻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交流的偏见；创建一份在计划上类似《遐迩贯珍》的杂志被认为是合适的，因为编辑有其他职务的压力，考虑到时间因素，此刊最近已被停刊。为实现这一看法，本月 10 日在慕维廉牧师家开了一个会，一致达成了下列决议：

- 1、中文杂志由大约 12 页组成，从中国年开始，在中国月份的第一天发行。
- 2、杂志的价格是每期 12 文。
- 3、杂志的名字是《六合丛谈》（“Universal Miscellany”）。
- 4、杂志的宗旨是知识的传播，旨在促进中国人的世俗和精神的福利。
- 5、杂志大致每期要包括一篇甚至多篇宗教方面的文章，一篇关于科学主题的文章，一篇总体上是文学特征的文章，外国和本地新闻的摘要，每月天象，上海港口的统计数字，现在的价格，广告等。
- 6、某些科学（题材）应由相关的系列文章组成，用通俗的方式处理。
- 7、每篇文章后附作者的签名。
- 8、杂志开放，接受新教传教士和汉学家的来稿。
- 9、每一位来稿者有充分的自由使用他自己的术语，为消除任何的混淆，编辑在认为必要的地方，可以允许加附注。
- 10、杂志在墨海书馆印刷和出版。
- 11、执行委员会的不断的目标是使杂志自助，但是因为中国人尚未能充分欣赏这样一份杂志的价值，秘书受命向外国团体的成员送一轮通知，为增进这一目的，恳求他们金钱上的支持。
- 12、上述决议应印刷和传播。”

从这篇缘起中可以看到，《六合丛谈》创刊的目的是想通过向中国人灌输西学知识，从而消除中国人的偏见。和上述《六合丛谈》的小引相比，更突显了欧洲人强烈的文明优越感，他们大多信奉“知识就是的力量”的信条，欲通过知识的传播来达到征服中国之目的。从上述缘起还可看出，《六合丛谈》的英文标题最初是 Universal Miscellany，后来才改为 Shanghai Serial。

在最后，还附有管理委员会的名单，主席为英国圣公会好不生（John Hobson, British Chaplain）牧师，还包括皇家外科医生学院会员雒魏林（W. Lockhart, 1811-1896, M.R.C.S.）、W. S. Brown、汉璧理（T. Hanbury, 1832-1907）、H. H. Wiggins、李泰国（H. N. Lay, 1832-1898）、慕维廉牧师、艾约瑟（B.A.）牧师、杨格非（Griffith John, 1831-1912）牧师、古陆吉（H. Z. Kloekers）

牧师、编辑伟烈亚力先生、秘书为韦廉臣牧师 (B.A.)。好不生为英国圣公会传教士，1849年来华，1862年去世。汉璧理是英国商人，1853年来华，在上海经营地产致富，可能赞助了《六合丛谈》的出版。李泰国是英国领事官李太郭 (G. T. Lay) 的长子，1853年到上海，任副领事，不久任中国海关第一任税务司。古陆吉 1855 年来华，先后隶属于荷兰布道会和英国浸礼会。由此可见，不同教会的牧师、商界和使馆人士参与了管理委员会，从中可以推想运作的方式。

作为伦敦会派往上海的印工，伟烈亚力的信件透露了许多墨海书馆印刷方面的信息，如某些著作的发行量，这对了解西学的普及程度有一定帮助。伟烈亚力在 1857 年 10 月 7 日的一封信中，曾详细列出了墨海书馆从 1857 年 4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印刷的中文著作的页数和数量，除了圣经等宗教著作以外，《代数学》印了 500 本，《六合丛谈》的发行量依次如下：4 期 5300 本、5 期 5000 本、6-8 期 4000 本、9 期 3000 本，由此可以看出其销售数量逐渐下滑。

通过对伦敦会传教士信件的研究，能够进一步了解墨海书馆时期英国人在上海所从事的印刷、传教和西学传播等活动。本文引用其中一些资料旨在对《六合丛谈》编纂的缘起有更深的理解，同时，本文也想作一引玉之砖，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批档案，作一些系统的研究。